

李卫民 著

本土化视域下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卫民 著

本土化视域下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土化视域下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李卫民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420-2

I. ①本… II. ①李… III. ①口述历史学—研究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3230 号

责任编辑 李 卫

封面装帧 张志全



本土化视域下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

李卫民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9 插面 2 字数 124,000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420-2/K·2257

定价 35.00 元

作者简介

李卫民，男，历史学博士后，博士，现供职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目 录

导论 冲破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围城	(1)
一、从两部重要论文集看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围城现象	(1)
二、从三篇文章看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本土化趋势	(7)
三、研究设想与架构	(12)
 第一章 当代人能否研治当代口述历史	
——以《马烽无刺》为中心的考察	(16)
一、当代人治当代史的困难与优势	(16)
二、当代人治史的独特视角	(22)
三、如何使用口述史料	(28)
 第二章 口述历史的文体、特点和作用	
——以《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和《往事回顾》	
为中心的考察	(32)
一、口述历史的文体	(34)
二、口述历史的特点	(40)
三、口述历史的作用	(52)
 第三章 口述历史的学术潜力探研之一	
——对三部学术性口述历史专著的研究	(56)
一、利用口述历史进行考证的典范——《人有病，天知否》	(58)
二、利用社科理论进行规范的口述历史研究	
——《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	(71)

三、运用口述历史进行学术研究的突破——《口述历史分析》… (76)

第四章 口述历史的学术潜力探研之二

——两种重要的学术借鉴 …… (81)

一、对现有口述历史作品的分析 …… (81)

二、借鉴之一——唐德刚的著作 …… (86)

三、借鉴之二——陈登原《国史旧闻》 …… (89)

第五章 从史料笔记看口述历史的规范化发展 …… (93)

一、史料笔记与口述历史的亲缘关系 …… (93)

二、从史料笔记看口述历史的功能 …… (98)

三、从史料笔记看口述历史的规范化发展 …… (101)

第六章 再论口述历史的民主性 …… (108)

一、回顾既往 …… (108)

二、口述历史民主性之一——揭秘性 …… (108)

三、口述历史的民主性之二——通俗与深刻的辩证统一 …… (111)

四、口述历史民主性之三——新型叙事史 …… (113)

第七章 口述历史的本质：两种权利的融合 …… (117)

一、当事人的权利 …… (117)

二、历史学者的权利 …… (127)

结论 …… (133)

附录 参考文献 …… (135)

导论 冲破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围城

目前,国内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存在诸多问题,现有论述多脱胎于英美学者的理论体系,缺乏原创性的本土化理论研究成果。虽然关于口述历史的理论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是,重要的理论突破却不多,绝大多数作者仍在不停地重复已有结论,不客气地讲,口述历史研究,已形成严重的围城现象。

一、从两部重要论文集看口述历史 理论研究的围城现象

这里要研讨的两部口述历史论文集,皆是口述历史研讨会的参会论文集。《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是2004年12月10日到12日在扬州召开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及学科建设会议”的参会论文集,2005年9月正式出版。2006年8月28日至29日,首届“海峡两岸口述历史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参会论文和会议专题发言汇编成书,2007年6月出版,即《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研讨》一书。扬州会议的主办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省社科联、扬州大学、《当代四川史研究》编辑部等。2006年的上海会议,由当代上海研究所主办,这是一家专业性研究机构(目前已并入其他单位)。从参会学者来看,在扬州会议上,很多资深学者提交重量级论文,一些与会的学界新秀的文章,质量也不容小视。上海会议,规格不及扬州会议,但也有不少著名学者与会,而且参会学者的代表面更为广泛,包括了从

事口述历史图书出版策划的人士、在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领导同志、报告文学作家等,当然,参加过扬州会议的程中原、朱元石、周新国、丁慧超等人,也参加了上海会议,还应指出,几位台湾资深口述历史学者张力、许雪姬、沈怀玉以及香港作家总会会长胡志伟等,也提交了论文。可见,上海会议的学术水准,也达到了一定水平。

无论是《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抑或是《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都是较高水平的专题论文集,甚至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当时国内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譬如,《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不少论文后来都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这是对这部论文集的学术质量的最好说明。《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一书中文章的作者,多有口述历史工作经历,文章内容比较扎实,不尚空谈,文章的质量也达到一定水准,事实上,这部论文集也有较高的征引率。总之,这两部论文集,相隔两年出版,两相比较,可看出国内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进展状况。

2004年的扬州会议,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明显带有总结既往的意味。国内引进现代口述历史,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到2004年,已满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在这二十多年中,不少海外的口述历史著作在国内出版,欧美口述历史理论权威著作《过去的声音——口述史》(*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Paul Thompson)的中译本,于2000年在国内公开出版,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可靠的学术资源。也是在这二十多年中,国内的不少学者致力于介绍西方口述历史理论,杨立文、杨雁斌、杨祥银、钟少华、沈固朝、齐小新等人,是这方面引人瞩目的学者。年龄尚轻的杨祥银在扬州会议前夕(2004年11月)推出个人专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国内首部口述历史理论专著。书中杨祥银借鉴海外口述历史研究成果,对口述历史的理论、方法,以及国外口述历史的发展历程,作了较全面的介绍,作者还初步总结了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口述历史(包括大陆和台湾)。将《与历史对话》和《过去的声音》合读,读者可对现代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有初步的了解。还应该看到,历经二十多年发展,国内口述历史也有很大进展,不少高水平口述历史著作面世,其中的经验也应认真总结。

在扬州会议上,周新国的《中国口述史学的回顾与前瞻》,丁慧超的《近 20 年来国内口述史研究述评》,姚力的《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梁景和的《关于口述史的思考》,都是针对既往口述历史发展的总结性文章。这四篇文章,展示了国内口述历史研究的新气象,显示出研究者对口述历史理论已多有了解,并开始致力于本土化理论建设。梁景和在文章中对美国口述历史发展史有简要回顾,他所依据的,是杨祥银的论文。周新国在文章中,已熟练使用“现代口述历史”这一概念,并以此展开对国内口述历史的评析。值得注意的是,丁慧超对 20 世纪 80—90 年代和新世纪以来国内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作了全面评析,虽然有些论断不甚确切,资料搜集也有欠缺,不过,他确实下工夫对二十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国内口述历史理论研究作了详细分析,在他看来,80 年代,杨立文、孟庆顺的观点,明显对立,在 90 年代,以杨雁斌为代表,国内学者对西方口述历史理论的介绍又有新进展。不过,史学理论工作者对本土口述历史成果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①姚力与丁慧超有同感,她和丁慧超一样,也系统阅读了杨立文、孟庆顺、杨雁斌、沈固朝、庞玉洁、杨祥银、钟少华、周新国等人的研究成果,丁慧超没有提及的成果,如张广智、庞卓恒等人的论著,姚力也有涉猎,姚力的观点,较丁慧超更为鲜明,她认为,国内的口述历史研究,“接受西方研究的多,具有独到研究的少”,“零星研究的多,系统研究的少”,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不足,对口述历史的发展有明显制约作用。^②姚力的文章,说明国内学者在基本熟悉了现代口述历史的理论方法之后,已不满足于此,他们对本土化的口述历史理论成果有了更多期待。事实上,梁景和在文章中也指出,“中国口述史的基本状况和特点还研究得不够,需要认真地总结”。^③可见,多多关注国内口述历史现状,建构本土化理论体系,已是学者共识。这也反映出新世纪国内口述历史的发展趋向已有所变化,简单的引进吸收已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当然,在《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收入的文章中,确有几篇论文,包

① 丁慧超:《近 20 年来国内口述史研究述评》,《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姚力:《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第 38, 39 页。

③ 梁景和:《关于口述史的思考》,《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第 87 页。

含了对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的独立思考的结果。梁景和的《关于口述史的思考》和荣维木的《关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都明确指出，应该严格区分“访谈录”与“口述历史”，他们都认为，“访谈录”是史料，“口述历史”是史学研究成果，是“表述历史的一种方式”。^①这一论断，海外学者亦未清晰表述过，尽管荣先生、梁先生的文章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但是，他们的思路、方法值得重视。具有丰富口述历史实践经验的程中原的《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对口述史下了定义，“亲历者叙述的历史”，他认为，这个定义有三个要素：“亲历者”“历史”“叙述”。他还详析“亲历者”的分类，包括“历史事件的主角”“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其他知情人”，他还强调，“不是亲历者(或者说当事人)叙述的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是口述史，必须是历史才算”。程中原的叙述很可取，他对亲历者的分类，有独到之处，值得重视。^②很明显，程中原的观点，来自他的大量口述历史实践。采访、整理《十年风雨纪事》的朱元石，在《关于口述史问题的一些研讨》中，详细介绍他们的整理方法，即适应口述者的个人特点，在标点、断句、分行、分段等方面，多用功夫，使文稿充分表露口述者的语言、思维特点。朱元石的方法，应被视为在中文语境下开展口述历史的重要收获和重要参考。^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的刘萍的文章《对口述历史实践的一些体会》，针对口述历史文本的整理，提出重要意见。刘萍的意见非常全面，关于口述历史文本是否要保留原始问答，这是“口述史学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刘萍认为，保留问答非常必要，因为这能显现出“访与谈的互动作用”，关于原口述中的某些特有的错误表达(如某些老人脱口而出的“满洲国”“大东亚战争”等)，刘萍主张，不必删节，也不必加引号，保留原始内容，视情形加注说明，刘萍还认为，在整理口述历史文本时，要注意使用“口述与文献互证”和“口述与口述的互证”，以订正口述中的失误。^④刘萍的文章，与朱元石的文章一样，应被视作中文语境下开展口述历史的重要收获和借鉴。当然，刘萍的意见，有的也

① 荣维木：《关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第105页。

② 程中原：《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第67—68页。

③ 朱元石：《关于口述史问题的一些研讨》，《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④ 刘萍：《关于口述历史实践的一些体会》，《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第168、169页。

来源于海外学者的成果,比如,强调“口述与文献互证”,就是借鉴唐德刚先生的观点,不过,刘萍的论证,也融入了个人的工作感悟。

可见,随着口述历史实践的增多,国内学者对口述历史的认知逐渐深化,在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方面,自家心得日渐增多,已有摆脱依附于欧美论述、构建本土化言说的迹象。

综上所述,2004年扬州会议,标志着国内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转向。很多研究者在基本掌握现代口述历史的理论之后,开始结合国内已有的口述历史著作,积极探索本土化的、中文语境之下的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换句话说,以扬州会议为起点,国内口述历史的理论探索进程,展现出新的面貌,侧重点由主要引进海外理论,转向在引进的基础上展开原创工作。应该指出,扬州会议上的多篇论文,已指示出口述历史理论本土化的关键,应该是认真总结、梳理国内现有口述历史著作的学术经验。

从2004年的扬州会议,分析2006年上海会议的学术进展,能看出口述历史理论研究方面的进展实况。如上所述,上海会议的规格不低,参会论文亦有一定水平。总的来看,上海会议的论文,还是出自有实践经验的人的文章,有很多新意。比如,天津市政协方兆麟的文章《政协文史资料与口述史》,针对不少学者的观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不符合现代口述历史理念”,他举出大量实例,证明此种观点实出于无知,他认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与现代口述历史理念多有契合,若完全按照美国的口述历史理论审视国内情形,此种做法并不恰当。此外,章玉钧、张家钊等人,介绍四川口述历史的历程,强调政府支持是关键因素,这种意见也有其道理。王炎的文章《口述历史工作中的法律和道德问题》,强调口述历史工作面临不少法律和道德问题,学者应预为之计(当然,王炎的文章,存有错漏)。另外,章玉钧《四川口述史工作:感受与探讨》,将口述历史的地位定为,“正如研究古史当以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这也属口述文化)为三重证据,当代史研究可以而且应当以文献档案、实物和口述史料为三重证据,相互参照、核对、印证”。^①这一提法,比较全面,值得重视。

^① 章玉钧:《四川口述史工作:感受与探讨》,《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上海会议的其他参会论文,则出新不够,特别是在本土化的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上,缺乏新意。苏智良的《推进中国口述史的建设》一文,对口述史的性质、特点、优缺点,皆有论述,他认为,口述史具有“强烈的民间化色彩”,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活动”,口述历史也有缺点,“口述历史有失实的地方”,“最佳办法还是口述与文献互相补充”。很明显,这些观点,学界早已达成共识。马宝妮、陈卫鹏、郑彦卿的文章《口述史学——一种全新的治史方法》,该文论述口述史学的学科特征、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关于口述史学的学科特征,作者认为,首先,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其次,口述史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而杨祥银在他的《与历史对话》一书中,概括“口述历史的特点”,包括“民主性”“合作性”“动态性”“跨学科性”,杨祥银的专著在2004年底出版,先于马宝妮等人的文章。另外,马宝妮等在阐释“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时,主要引述杨雁斌、钟少华、杨立文等人的观点,并无创新。至于马宝妮等人的文章中关于“口述史学的学术规范”的论证,仅仅强调采访者要与受访者良性互动,至于采访者怎样纠正受访者的某些失误,则语焉不详,这样的论证令人遗憾。更值得指出的是,苏智良文章和马宝妮等人文章,皆有对现代口述历史历程的回顾,都是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芮文斯(Allen Nevins)等,内容固然不错,但缺乏新鲜资料,陈陈相因。另外,曾参加扬州会议的周新国、丁慧超提交论文《当代中国大陆口述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与他们在扬州会议上的论文相比,没有突破。

应该指出,参加上海会议的部分港台学者的文章,胡志伟的《海峡两岸口述历史的今昔及其牵涉的若干道德、法律问题》,沈怀玉的《口述历史在台湾的发展》,许雪姬的《他乡的经验: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海外活动口述访谈》,以及游鉴明的《倾听她们的声音:从邵梦兰女士的访问记录说起》,这几篇文章内容扎实,特别是沈怀玉和许雪姬的文章,以自身体会为基础,详细讲解口述访谈的前期准备、访谈技巧及整稿方法,具体详尽,且多有大陆同行所未曾讲过的,故此受到广泛关注。沈怀玉、许雪姬的文章,为大陆同行提供了总结访谈技巧的典范。

翻读2006年上海会议的论文,发现国内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进程并不

令人满意。经过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大量译介,国内学者对现代口述历史的发展历程已较熟悉,对英美口述历史的理论体系,也有一定了解,能够使用其中的一些词汇铺陈文章。随着时间推移,国内学者在口述历史的不少问题上,已达成共识,专业研究者应当以这些共识为基础,进一步突破,构建本土化的口述历史理论体系。但是,从上海会议的论文来看,较之扬州会议,在理论创新方面,缺乏突破、进展缓慢,研究者满足于现有结论,不仅文章内容陈陈相因,文章写法也有雷同之处。甚至可以说,在扬州会上已冒头的构建本土化口述历史理论体系的良好趋向,在上海会议中,并未得到延续。口述历史的理论研究,似乎已困在原地,难以突破,谓之“围城现象”,大致不差。

二、从三篇文章看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本土化趋势

这里讲的三篇文章,是指熊月之的《口述历史的价值》、左玉河的《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辛逸的《口述历史新解——以山西十个合作社的口述历史为例》。这三篇文章,可以代表新世纪以来中国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进程。^①首先,这三篇文章是公认的权威性论文。熊月之的《口述史的价值》发表在《史林》杂志 2000 年第 3 期,根据中国期刊网显示的信息,截至 2013 年 8 月,《口述史的价值》已被其他学者征引 55 次,在所有口述历史理论研究论文中高居榜首。左玉河的《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发

^① 2000 年之前,国内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主要是介绍欧美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成果,代表性论文有杨雁斌:《口述史学百年透视》、《重现与印证历史的历史学》,齐小新:《口述历史在美国刍议》,杨祥银:《试论口述历史的功用和困难》,沈固朝:《与人民共写历史》。这些论文对欧美口述历史的发展历程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并系统介绍了现代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5 年第 1 期刊登徐国利、王志龙文章:《当代中国的口述史学理论研究》,对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国内口述历史理论作了总结。徐国利、王志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可以看作是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拓荒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多是译述海外的研究成果,当然,国内学者也开始对口述历史展开深入研究,包括口述历史的学科定位,口述历史的特点、功能、研究方法等。徐国利、王志龙认为,由于国内口述历史尚不发达,口述历史理论研究还处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他们指出,“我们还缺乏从大量的口述史学成果中总结出的原创性和系统性的理论”。徐国利、王志龙的看法,比较中肯。

表在《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后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历史学》2006年第7期全文转载,又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16期全文转载,该文还被《新上海档案》2006年第9期摘要转载。口述历史的研究文章,被如此之多的权威文摘杂志转载,至为罕见。辛逸的《口述历史新解》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后被《新华文摘》2011年第23期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可视为近期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代表作。其次,这三篇文章的发表时间,证明它们可以被视作新世纪口述历史研究的代表作。熊月之的文章发表在2000年,恰为新旧世纪之交,左玉河的文章发表在2006年,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点,辛逸的文章发表在2011年,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从熊月之的文章到左玉河的文章,间隔6年,从左玉河的文章到辛逸的文章,间隔5年,两次的间隔时间,大致相仿。新世纪已过去13年,从时间意义来看,这三篇文章,由远及近,深具代表性。总之,从这三篇文章来分析新世纪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历程,是可行的。

熊月之的《口述史的价值》,是原创性较强的论文。熊月之对海外现代口述历史也有一定了解,不过,《口述史的价值》,是一篇主要利用本土资源展开论证的文章,换句话说,这是一篇在中文语境下探讨口述历史理论的论文。关于口述历史,熊月之接受了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的定义,不过,他的思想比较开放,在他看来,新中国建立之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项目,都是接近现代口述历史的文化工程。所以,在这篇文章中,熊先生主要利用国内资源,特别是上海的口述历史资源,分析了口述历史的特点、作用和方法。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史料形态,经过了“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几个阶段,他进一步指出,档案文献,偏重于“统治阶层”“社会精英”的活动,严重缺乏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欲研究百姓心态、社会风尚等,会感到资料欠缺。口述调查、口述采访,可有效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关于口述采访的方法,熊先生强调,采访者要认真分析受访者,想方设法令受访者乐于开口、愿意深入交流。熊先生对口述历史的缺陷也有分析,他认为,由于记忆、情绪、选择等因素的影响,口述历史往往存在一些错漏,这些都有待于历史学者的深入采访和整理考订。

熊先生的文章发表之后,其中的不少结论,被其他学者承袭。比如,关于口述者出现失误的原因,很多学者接受了熊先生的分析(苏智良:《推进中国口述历史的建设》即是如此),还有,口述历史可以展示“普通市民的社会心理”,2006年荣维木提交扬州会议的论文《关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其中就曾专论口述历史“能够生动地表现出社会心理的发展过程”,^①此外,熊先生特别引用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做法,强调在口述历史工作中,不能缺少文献功夫,这一点,更是被后来大量学者所仿效。

《口述史的价值》发表于2000年。在此之前,在国内学术界,口述历史理论研究文章已不鲜见。不少研究者花费很多精力,根据外文资料写出不少论文,也很引人瞩目,但是,熊先生文章后来居上,引用率居高不下,这非常耐人寻味。其中原因,应该是熊先生多采用本土资源,且熊先生曾亲身参加口述历史实践,有切身体会,文章不尚浮华,不以堆积艰深的外来理论名词取胜,平易近人,中文语境下的理论论述,读者容易接受。可以说,熊先生的这篇文章,学风好、文风好,是口述历史理论本土化的重要收获,其内容固然值得重视,其学风、文风,更应获得赞许。稍感遗憾的是,在口述历史学者中,这种文风并未得到重视。^②

左玉河的《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其中的不少内容值得重视。

左玉河在文章中,列举当时中国口述历史的“三大隐患”。“一是理论先天不足”,“不仅缺乏独到的研究成果,远未形成较为完备的口述历史理论和方法,而且连口述历史的基本概念、基本属性、学科归属等问题也模糊不清,更不用说将口述历史提高到学科的高度加以建设了”;“二是口述历史实践缺乏工作规范”;“三是研究缺乏深度”。他认为,目前关于口述历史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的深入的研究成果。左玉河的这三点概括,被研究者频频引用,影响很大。在我看来,这三点不足,第一点和第三点最重要,

① 荣维木:《关于口述历史的概念界定》,《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第107页。

② 2004年出版的《口述历史》第二辑,刊载钟少华先生《呼唤中国口述史学腾飞》一文。此文内容较全面,对国内口述历史的发展,也作了回顾。钟先生倾向于海外学者的观点,在点评国内口述历史著作时,有些批评性意见不够客观,说理论证也不充分,故此文虽已发表有年,但影响却并不大。

对国内的口述历史著作发展缺乏系统、深入地研究,本土的学术经验未能得到梳理、总结,原创性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从何谈起?可以说,左玉河的文章,是在呼吁深度利用本土资源,尽快在本土化的口述历史理论构建方面有所改观。

《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一文当中,也有对本土资源进行研究的内容。左玉河对国内口述历史著作分别归类,他认为,现有口述历史著作,从采访者角度,可分作三类,即“社会学家用田野调查方法整理的成果”,“文学工作者用新闻采访的方法采制创作的口述作品”,“历史工作者用口述访谈方法整理的口述史著作”,在他看来,“这三类著作在口述方法、目标、重心及对象有很大区别”,只有最后一类才算得上是规范的口述历史著作。左玉河根据内容的不同,将口述历史著作分作三类,即“个人讲述一生或一段经历者”“群体回忆重大人物者”“群体叙述重要事件者”。左玉河在文章中,提及国内口述历史 30 多部,在同类文章中,是涉及面最广的一篇。当然,与熊月之相比,左玉河对待国内的革命家回忆录的态度更趋谨慎,熊月之认为,这些回忆录多是口述历史,而左玉河则有一定保留。

左玉河文章当中,理论性最强的部分,是他明确区分了“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这一点,确有借鉴其他学者之处(梁景和、荣维木),但是,左玉河有新的发挥和概括。他明确指出,口述历史分为两个层次,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口述史料,是口述采访的文字整理,采访者不应进行“改写、加工”,这是一种原生态的素材,口述历史,则是在口述史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加工、整理、提升”,成为反映历史的一种著述形式。左玉河对口述历史的两个层面的划分,比较清晰、明确、到位,而且确实符合口述历史工作的实际,为今后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总的来看,左玉河的这篇文章,对国内口述历史著作的归总、分类,让读者对国内口述历史的发展有了更全面、更系统的认识,他对“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区别,也是重要的学术进展,当然,他对本土化口述历史理论体系的呼唤,更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共鸣。左玉河的文章,可视为继 2004 年扬州会议之后,对本土化口述历史理论体系的又一次强调。

前面已经述及,2006 年的上海会议,在本土化口述历史理论的构建方

面,没有新的进展。随着时间推移,这一领域情形如何?辛逸的文章,很能说明问题。辛逸并非专门从事口述历史研究,但是,他的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共党史,与口述历史关系紧密,辛逸也确实作过较多的口述调查与采访,经验丰富,他又搜集了大量口述历史理论研究成果,写成了这篇质量颇高(并非无可非议)的《口述历史新解——以山西十个合作社的口述史研究为例》。全文的主题是,怎样进行口述历史研究。辛逸对国内口述历史理论研究作了全面考察,他博采大量资料,针对两种重要观点“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逐一辨析。辛逸已觉察到,有些学者主张可利用口述史料构建口述历史著作,但是,他提出问题,口述史料占多大比重,方可成为口述历史著作?辛逸指出,根据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和《胡适口述自传》等口述历史名著,构建口述历史著作,需要大量文献资料,因此,主要凭借口述历史,很难深入进行研究,坊间大量的“完全是亲历者口述记录的口述史作品”算不上研究著作。另外,关于“口述历史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辛逸认为,由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新闻学都采用口述采访的方法,因此,强调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不够准确。所以,辛逸认为,“将口述史学认定为历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或一种研究方法,主张者还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充足依据”。在文章当中,辛逸介绍了他的口述采访经验,针对20世纪50年代初长治老区合作社的创办经过,辛逸在北京、山西等地,采访诸多当事人,并挖掘不少地方档案,将当事人口述与档案对照,证明当时创办合作社,主要出于山西省主要领导的创意,并非来自农民的主动请求。辛逸还认为,目前,稳妥的口述史学研究方法,应该是将口述史料与文献资料、实物资料有机结合,互相“证释”“参证”“补正”。

辛逸的文章,征引了大量口述历史理论研究成果,因此,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总结性。更值得重视的是,辛逸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了“怎样利用口述历史进行学术研究”。这是一个少有学者涉猎的课题,因此,他的文章确实具有原创性。他提出的口述历史研究方法,也确实可行。所以,这篇文章是探索本土化口述历史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收获。

不过,辛逸的这篇文章,也有明显不足。他在研讨“怎样利用口述历史